

# 十九世纪的德国 与中国

施丢克尔著

乔松译

# 十九世紀的德國 與中國

施丟克爾著

喬松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三年·北京

Helmuth Stoecker  
DEUTSCHLAND UND CHINA  
IM  
19. JAHRHUNDERT  
Rütten & Loening  
Berlin, 1958.

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吕登与绿宁出版社 1958 年柏林版译出

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

(德)施丢克尔 著

乔 松 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2 · 插页 2 · 字数 288,000

1963 年 7 月第 1 版

196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02·364 定价(七)1.60 元

印数 0,001—5,620

60607/12  
34

## 前 言

本书第一章至第十一章系将 1956 年为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所通过的博士論文加以修正和扩充而成。阿尔弗德·毛瑟尔博士、盖尔哈尔德·希菲尔德博士和西格弗利·貝尔辛格博士等各位教授曾給予有益的評論，使这篇論文得以写成，教授阿尔白尔特·舒萊尔博士則从一开始就鼓励我去注意德中关系的历史，笔者特在此对他們表示深深的感謝。波茨坦的和迈尔斯堡的德国中央档案局的工作同志，特别是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局的貝克夫人和呂特蔡克博士、安德斯博士和舒迈德先生也都曾給予热心的帮助，均应致以謝意；此外还应感謝德国国家图书馆、柏林大学图书馆的工作同志，以及洪堡大学通史研究所現代史部門图书馆員杜林夫人。

范文瀾教授先生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工作同志友好地把我向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很詳細地作了答复。

第三章業經在历史学杂志第五年份，1957 年 2 月号发表过。

亥尔穆特·施丢克尔

柏林，1957 年 6 月

## 目次

## 前言

第一章 引子	1
第一节 导言 资料来源和参考用书	1
第二节 欧洲列强和美国的侵入中国(自开始至 1860 年)	5
第三节 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外国资本主义国家 剥削中国的方式	12
第四节 中国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中的发展	29
第二章 早期的德国对华贸易关系	37
第三章 普鲁士和德国加入在中国有特权的国家行列	53
第四章 建立普鲁士—德意志驻北京公使馆和东亚海军站	70
第五章 在中国领土上或其附近建立一个德国基地的计划 (1862—1873 年)斐迪南·李希霍芬作为帝国主义 扩张势力的开路人	78
第六章 1861—1885 年德国的对华贸易	98
第七章 修改中德条约和达成烟台协定	111
第八章 伊犁危机	133
第九章 外国资本家在华设厂问题及德国海军在汕头和 厦门的干涉	153
第十章 德国和朝鲜的条约(1882—1883 年)	160

第十一章	中法战争及俾士麦的政策(1883—1885年) .....	165
第一节	战事前的经过 .....	165
第二节	广州的爱国人民起义 .....	174
第三节	战争和列强的政策 .....	184
第十二章	1885—1894年争夺市场和投资范围的斗争 .....	211
第一节	政府对航行的补助 .....	211
第二节	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 .....	222
第三节	成立对亚洲业务的财团和德华银行 .....	230
第四节	大笔的军火买卖 .....	257
第五节	铁路材料和机器的供应 .....	279
第六节	工业化的问题 .....	287
第十三章	中德贸易关系的一般发展(1885—1894年) .....	291
第十四章	在山东省的德国天主教教会和德国的保护权 .....	296
第十五章	试探结成联盟和可能由中国在军事上进行 牵制的问题 .....	313
第十六章	结束语 .....	324
附录:	文件, 引用资料、著作目录, 人名、地名及其它 对照表	

# 第一章 引子

## 第一节 导言 资料来源和参考用书

这个作品是論述那正处在形成时期的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史的。它討論的范围是一門相当新的学問，因为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以前，德国和中国的关系几乎从未作过研究和叙述的对象。

关于德国大量公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关文件<sup>①</sup>，在有关德国对东亚政策部分是从1894年起才开始考虑的。叙述这一时期以后的德国帝国主义政策的资产阶级著作，内容虽然广泛，但对德中关系的早期历史，或者根本不提，或者三言两語，一笔带过<sup>②</sup>。

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的两个动机现在看起来是适当的。一方面，鉴于德帝国主义在德国的一部分領土上已經卷土重来，殖民傳統在那里得到了鼓励不是偶然的培养，因而研究、叙述德国资本主义

① 1871—1914年欧洲各国政府的大政策。外交部委托雷浦錫吾斯等編纂，1922年起柏林出版。以下簡称大政策。

② 例如郎格爾，1890—1902年的帝国主义外交，紐約1951年，一七六頁及以下各頁；傅兰克，1894—1914年列强在东亚，卜劳恩舒達胸1923年，二七頁及次頁；徐尔凱，远东在1895—1905年列强政治关系中的作用，柏林1929年，三九頁及次頁；法格思，国际政治中的德國和美国，卷二，倫敦1935年，九三九頁及以下各頁。苏联历史学家耶魯斯薩利姆斯基之以較大篇幅来叙述此事，并非偶然。（十九世紀末德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柏林1954年，四八〇頁及以下各頁）。

和帝國主義在過去參加對經濟落後的、殖民地的、附屬國的人民的掠奪、剝削、奴役，就成為先進的德國歷史學的責任。另一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親密友好關係的建立，喚起了人民對德中關係的極大興趣，但至今還非常缺乏科學的資料來滿足這方面的需要<sup>①</sup>。

在這一部作品里，主要地是研究德國資產階級和受命於這個階級的外交家對中國所追求的目的和應用的手段。應該指出，德帝國主義在中國擴張的經歷能回溯到多遠，以及中國和對它有進貢義務的國家在普魯士和德意志的政策里，特別是在俾士麥的政策里，在帝國主義以前的時期和過渡到完全發展的帝國主義時期占什麼地位。在這裡應特別注意政治方面，因為有關商業方面在普魯士的檔案及從1880年起在德國的檔案里，在政府向國會提出的許多咨文里，在德意志帝國的統計里（此項統計關於德中貿易方面當然要從1880年起才可利用）和在那篇貢獻很大但未付印的考爾夫博士論文中<sup>②</sup>，業已提供了浩瀚的資料。

由於過度缺乏早年的研究資料（除考爾夫的博士論文外，關於聯邦建立以前的材料，保存下來的只有一些根據公文而作的簡短論述<sup>③</sup>），以及引用的印成資料之極端分散，使解決這個問題更為困難。要不是1954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令人可感的將前駐北京德

① 德國資產階級歷史研究之不受討論中德關係是有跡象可尋的，它連一篇關於記載德國在1900—1901年軍事干涉的作用的專論也沒有。

② 德中直接航空交通從設立起到世界大戰爆發，法律與政治學博士論文，基爾1922年。

③ 巴煦，漢堡和前印度及東亞的現代化交通的開始，載在：漢堡地理學會通報第十三期，1897年九二頁及以下各頁；韋德延，十九世紀中葉在中國領海的德國的商業航運，載在：漢撒歷史報，第六七——六八年份，1942—43年，二二二頁及以下各頁；費希德，用北德同盟的海軍保護在東亞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根據海軍檔案中未公佈的文件，全文載在：海軍評論1937年六至八期。



國使館檔案<sup>①</sup>移交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話，我就很難有可能來使用那些材料。雖然在現存的這些資料中有嚴重的缺陷（其中一點，即秘密的文件顯然在相當長久時間以前即被抽去）。這個範圍廣泛的、數達幾千束的檔案，包含有對於中國對外關係史，特別是對德關係史，極其寶貴的，富於啟發的資料，其中主要的是1864年以後絕大多數的公使或代辦致外交部報告的底稿，及德國政府給使館的訓令。此外包含着使館與總理衙門和各國駐華公使及使館與德國領事館和商人們廣泛的往來書札，以及大量的中國官方文件。此外，在未付印的資料方面，還引用了外交部第二司（商業政策司）的文件以及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普魯士政府和薩克森政府的文件。

德國公使巴蘭德的回憶錄<sup>②</sup>也對在這個時期的德中關係史提供了資料的來源，但在引用時必須極其審慎，因為巴蘭德想盡方法把他個人和德國的政策說得尽可能地有利，以此對一些重要的事件緘口不言，或在某些事件中完全捏造。此外，法國歷史學家亨利·高第那一部三卷的著作，“1860—1900年中國同西方各國關係史”<sup>③</sup>也很有用處。高第是一個著名的中國通，他的著作是以法國外交部的中國卷宗為基礎的，有的部分只是將法國外交部所有的文件匯編加以合訂而成，並在細微之處都非常可靠見稱。這本書雖然公開地、有時笨拙而天真地、有時冷嘲熱諷地為法國殖民主義辯護，但在材料上是有它的價值的。在這個問題上還引用了美國人H. B. 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sup>④</sup>一書的第二卷，但用處

① 以下簡稱使館卷。

② 三十三年在東亞，三卷，來比錫1901年。

③ 巴黎1901年。

④ 三卷，倫敦和紐約1910年，1918年。

較少，因為該書僅偶而考慮到對德國的關係，而且寫法並非一無錯誤，同時馬士所用的是作為歷史資料極慎重才能加以利用的上海英國報紙及倫敦和中國的電報。馬士出身於中國海關並且是赫德的一個親密同事，他在著作中美化了、甚至於理想了赫德所扮演的角色。這位歷史學家雖然喜歡打扮成為一個超越於黨派之上的、懂得一切的、寬大為懷的史官，但他卻設法為英國的強盜政策作辯護，他認為這種政策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無可避免的，並將奴役中國的罪行轉嫁到無能的中国統治者身上。他的偏袒，雖然不像高第那樣公開，但是在許多地方，像在批判地敘述法國的競爭政策時，就明白地表現了出來。季南那部基本利用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卷宗為主的、詳盡的著作，“1880至1885年間英國在華的外交”<sup>①</sup>，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特別是那無數從英國公使館報告中摘錄的材料，這個作者對資本主義各國對華政策的敘述，是相當符合歷史事實的。

相反地，在那一部由蘇聯科學院茹科夫主編下發表的著作“遠東國際關係史（1870—1945）”<sup>②</sup>對德國在建成聯邦後的二十五年中對華政策史的敘述基本上是正確的，雖然篇幅失之過簡，但這在一种包括範圍極廣的著作中是不可避免的。我要感謝這部著作給我的寶貴鼓勵。納羅奇尼茨基所著的那部內容豐富的和極有價值的專題著作，“1860—1865年資本主義國家在遠東的殖民政策”（莫斯科1956年版），在本書完成後才到達筆者手中，因此引用的地方不多。

① 劍橋1939年。

② 德文譯本，柏林1955年。參閱載在：歷史學雜誌第四年份，1956年6月的一篇評論。1956年在莫斯科發行過一種新版本，將時間擴展為從1840年至1949年，但該本筆者至今未見到。

这部著作中所接触的問題，并不是全部都能根据手头的資料來說明的。可惜的是，外交部政治部門的卷宗尚未公开，否則要明了、甚至要对俾士麦政策的許多方面有所新的发现，也未始沒有可能。至如在这部著作中未占主要地位的中国政府政策，則可由已經公布的清代对外政策的中国文件和其它中国公文来广泛、正确地加以說明。

在写这部著作时，我首先着眼于以事实为根据，从而认为在引用史料、尤其是未曾印过的史料时，正确的方法是毫无省略地引用全文。

## 第二节 欧洲列强和美国的侵入中国 (自开始至 1860 年)

十六世紀初期葡萄牙航海者已經一面进行貿易，一面从事劫掠，在中国南部建設許多小的居留地，但是因为犯下了多种多样的罪行而为人深恶痛絕，以致遭到了中国人多次驅逐。他們最后只好局处于广州附近的小居留地澳門。从十七世紀初期起，在中国海岸也出現了荷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船只。这些国家的航海者和商人在中国南部創立了中国代理行，干脆用豪夺的方法或在貿易上用巧取的方法榨取中国人民，教士也来到了这个国家。六十年代末耶穌会創建了許多天主教堂。他們甚至在宮廷里也获得了影响，因为他們懂得怎样来利用介紹欧洲科学知識的机会。别的教派的教士也接踵而至。

俄国統治之擴張到西伯利亚，使俄国和中国划定了共同的边界，建立了貿易关系，并使中国同外国簽訂了一个現代化的条約（1689 年的尼布楚条約）。到了十八世紀的前半世紀中，执行英国

對華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壓倒一切競爭者。自此以後一直到二十世紀，英國在參加奴役和掠奪中國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一直占着首屈一指的地位。

中國人根據和外國人接觸所得的經驗，大抵都把他們看作是討厭的、不歡迎的侵入者。十八世紀時，中國政府由於恐懼資本主義國家可能利用中國人民對於反動的滿洲政權的不滿以達到其目的，就轉而採取了——假使可能的話——對歐洲人閉關自守的方針。統治階級的當權人士曉得（像在日本一樣），要維持他們的統治，要保存原有的社會關係，隔絕本國和外界的聯繫是必要的，因為正像馬克思1853年所寫的，“完全的隔絕曾經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sup>①</sup>他又說，在隔離的方法被強迫結束以後，“則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分崩離析，這同小心謹慎地保藏在密封的棺材內的木乃伊一旦與外界接觸必然要發生解體的情形一樣”。

早在1722年康熙皇帝就已禁止中俄間的通商。1757年乾隆皇帝的一道諭旨，宣布廣州為唯一准許外國人貿易的地点。1724年基督教被禁，教士被驅逐。基督教會固然用秘密結社的方式繼續存在，但是歐洲的教士直至鴉片戰爭以後才重占地位。中國的各代皇帝拒絕和歐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和拒絕給它們的公使以平等國家代表的待遇，在這裡他們系從中國是一個君臨萬邦的帝制國家的假定儀式出發，它規定“外夷”的代表要處於貢使的地位。閉關自守的政策必然影響了中國的手工業、製造業和商業的發展，並且促成了歐洲人在十九世紀常常感到的那種“僵化”，或者工藝、文化都停止不前的狀況。

在那幾十年中，英國對華貿易有一個特殊的情形，即商業決算

---

①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二五頁。

是于英国不利的，因为中国的产品（主要是茶、絲和瓷器），欧洲固然是很需要，但中国对于欧洲的产品却无需要。“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无。”乾隆皇帝在給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曾这样写过<sup>①</sup>。

那些由英国人和（从1784年起）美国人經由广州輸出的茶叶<sup>②</sup>和別的商品大抵是用白銀支付的。“1830年以前，由于中国在貿易方面一直是出超的，所以白銀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輸入中国。”<sup>③</sup>为阻止此項令人不快的白銀流出，英国人轉到將鴉片由印度輸入中国上面去，不久白銀就开始倒流。从1800到1835年中国的鴉片进口激增<sup>④</sup>。鴉片的嗜好“很快地就到处風行，不久就成为一种遍及全国的恶习。許多官吏、紳士以至三教九流的人，凡是抽得起的，都沾染上这种嗜好，”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写道<sup>⑤</sup>。販卖这种毒品的貿易，——这种毒品对于吸食者的有害的后果曾屡被描写过——成了英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收来源，得到了它的尽力提倡。<sup>⑥</sup>

为了阻止在它这一方面白銀的流出，中国政府曾一再設法限制鴉片的輸入，但收效极微，因为英国人常向主管此事的广州官員行賄<sup>⑦</sup>。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作的一次断然决然的努力，却被英

① 东华录，乾隆朝一一八。

② 近十八世紀末叶时，从事中国茶叶貿易是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利藪；这项貿易的稅款約占英国国家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格林貝尔格，英国的商业同中国的开放，劍桥1951年，三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二三頁。

④ 馬士，卷一，一七六、一八二頁。

⑤ 費納克，近代远东史，紐約1941年，三五頁。

⑥ 瓦倫，鴉片，1839年，說英国商人和英国政府每年的盈余为六百万鎊。引自格林貝尔格，一一〇七頁。

⑦ 克勞賽，东亚史，卷二，哥廷根1925年，五九頁；格林貝尔格，四三頁。

國乘機用武力強迫開放了中國。由於英國商人和工業家——首先是怡和中國商行——的鼓動，而進行了英國對華的武裝侵略（鴉片戰爭），它以南京條約的締結（1842年8月）而告一結束，由於宮廷和王公大臣的張皇及清帝國在軍事上的失敗而被迫賠償軍費，為英國的貿易開放五口（廣州、上海、廈門、寧波、福州），割讓香港——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港口之一——於英國，接着又在事實上放棄了關稅自主權。<sup>①</sup>

兩年以後，美國和法國也得與清朝政府訂約，通過這些條約，它們的臣民也享到了中國給予英國那樣的權利。那個在武力的壓迫下和美國簽訂的條約中，初次明確地承認了外國平民在中國有治外法權的原則；美國公民今後不得由中國法庭，而只能由在中國土地上的美國法庭傳訊，從而在條約上為外人開放的通商口岸城市中，審判美國人之權，將移交給從事領事職務的官員。最惠國的條款，也就是對最惠國權利的要求，也初次在與美國所訂的條約中被清政府承認，它對於此項要求的意義這樣不了解，以致它不會主張，給予這項條款一個互惠的性質。法國人則為天主教教士要求並獲得了在條約口岸（按照條約開放為外國人通商的口岸）的居留權。

鴉片貿易在南京條約中故意地略而不提，但鴉片商人卻獲得可能，在以後二十年內，此類能致人於死的私貨的輸入，可增加若干倍<sup>②</sup>。馬克思曾指出其中的一個結果：“……與鴉片走私相連的賄賂行為，使南方各省中國官吏的風紀敗壞淨盡。正如同中國皇

① 除了茶葉以外，關稅限於百分之五。

② 馬士，中國的商業和行政，倫敦1913年，三六四頁；參閱馬克思致恩格斯函，1858年10月8日（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卷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四〇二頁）及克勞賽，六三頁。

帝常被认为是全国的君父一样，他的官吏們也就被視為是各該地区这种父权关系的維系者。可是这种宗法式的权威，这种把龐大的国家机器包容起来的唯一倫常上的联系，已逐漸被那些纵容鴉片走私而从中牟取巨利的官吏們的貪污腐化所侵蚀了。”<sup>①</sup>

綜括英国对华政策的結果，馬克思又說：“1840年不幸的战争后所要付給英国的賠款，巨大的非生产的鴉片消耗，鴉片貿易引起的金銀外溢，外国竞争对本地手工制造业的破坏性的影响，国家行政的腐化状况——这一切，造成了两个結果：旧稅更加繁重而难以担負，旧稅之外又增加了新稅。……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財政、道德、工业以及政治机构的破坏因素……”<sup>②</sup>。

但是英国侵入者在当时遇到的，并不只是腐敗的官僚政治和几乎不能认真抵抗它的中古式的軍制，而且也遇到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由于对“外夷”的深恶痛絕而不加掩飾地对他們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当战事进行时，在被占領的宁波曾爆发过一次起义，为了对它加以鎮压，英国不得不远从印度去調动援軍，1842年的条約簽訂了几个月以后，在广州的外商代理店，被城内义憤填膺的居民所毀。外国貿易重心这时移至上海，它发展成为資本主义国家掠夺中国体系的中心。

在鴉片战争所造成的局势后面，是反对清朝統治的大規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年）。这个大規模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发源于农民的“要求平等，要求成立宗法式的公社和实行物物交換的經濟。”<sup>③</sup>太平軍貫徹了許多措施（驅逐地主，平均分配

①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二三頁。

② 同上，二四頁。參閱克勞賽，六五頁：“虽然和英国的冲突，对于这个大国來說，只屬地方性質，但它仍发生了普遍的影响，引起了內部的混乱。”

③ 耶瑪紹夫，曙光照耀亞洲，柏林1951年，一五〇頁。

土地,实行义务劳动制及其它种种),这些措施都带有进步性质,因为他們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制度。但因在中国建立資本主义制度的客观条件尚未具备,太平天国革命沒有能消灭封建制度,而只是严重地动摇了它。<sup>①</sup>

太平軍統治了当时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它几乎結束了清朝的統治,当时这个王朝还受到中国北部的捻軍农民起义(1853—1868年)和云南的一支回民起义(1856—1873年)的威胁。英国和法国利用清朝的危險处境,一等到克里米亚战事告終,就对华掀起一个新的武装侵略。它們希望整个中国都对欧洲貿易“开放”,为扩大欧洲商品的市場創造条件。英国政府指摘中国官厅在一只船上逮捕去一些中国水手为它的侵略作辯护,其实这只船是非法地挂用英国旗的。法国政府用另一种借口来規避責任,这种借口像以后几十年中,每逢資本主义列强提出要求时,中国就須得忍受的,那就是一个傳教士被杀死了。

1856年10月英国海軍襲击广州,战事綿延到1858年,这座城遭到破坏和劫掠一空。由于清朝政府已将其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太平天国,因而不能有效地对付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北方的侵襲,于是与英国、法国以及美国和俄国在天津訂立了条約,在这些条約中,凡是这些国家提出的要求,几乎全部承认(1858年)。

当清朝政府正在抵抗英法联軍向天津的新的进攻时,1860年英国和法国再度装备了一支强大的远征軍,得以侵入天津,并且从那里沿路燒杀擄掠,长驅直入<sup>②</sup>,占領了京城。中国皇帝已經逃走,英法軍队在搶劫圓明园之后,又纵火将它燒毀,这件事将始終作为破坏艺术品野蛮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两国强迫清政府簽訂新条

① 參閱列伊茲納与魯勃卓夫,四九二頁。

② 參閱藍譜雷,巴夏礼爵士傳,卷一,倫敦 1894年,三五八頁及以下各頁。



約，其中含有最苛刻的條件。

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對資本主義國家作了許多讓步，在這裡只舉幾件犖犖大者。其它十個口岸，包括天津和漢口，也為歐洲和美國的貿易而開放（其中有三個在長江沿岸，只能等當時還占在那裡的太平天國失敗後才能使用）。賦與外國人以行動自由及在整個中國境內有購置土地之權；使鴉片輸入（由於美國代表的壓迫）<sup>①</sup>及苦力輸出，也就是奴隸買賣合法化；治外法權進一步形成，中國的關稅主權更受限制<sup>②</sup>。新舊兩種基督教的教士均獲准到中國內地傳教，中國政府有責任保護教徒。四個大國獲得在北京設立使館之權。賠償英國及法國的軍費各八百萬兩由關稅支付。<sup>③</sup>連俄國也利用中國的衰弱而擴張它的勢力於遠東。1858年割讓黑龍江北岸至太平洋一帶與俄國，1860年割讓烏蘇里江以東濱海省，在那裡俄國建起了海參崴。

1860年太平天國國勢蒸蒸日上，這時英、法為了對付太平天國，而和北京朝廷聯合了起來，這個朝廷在1861年宮廷政變之後，由年輕的慈禧太后和恭親王領導。依靠這兩個國家的軍事支援，滿漢兩族的封建主得以征服了太平天國，其結果是幾十萬信仰太平天國的人被屠殺，中國中部和南部的廣大地區荒蕪。在鎮壓捻軍時，也有歐洲的軍事單位參加。

由於太平天國的失敗和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的簽訂，中國在以後數十年間日益陷於附屬國家的地位。資本主義國家掠奪這個國家的一種特殊方法發展了起來，這種掠奪，主要地是用殖民地貿易

① 費納克，五〇頁。

② 對於多數貨品批准的稅率為百分之五，但是所有號稱指定為歐洲人用的商品免稅，其結果直至1902年大批消費品進口都不上稅。馬士，卷一，五三四頁。

③ 該條約在邁埃爾斯所編：清帝國同外國之間的條約一書中到處都是；高第，卷一，三頁及以下各頁，二一頁及以下各頁。